序言

1912 年孫中山出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遂成全國知名元首。而其生平與事蹟，隨着 1925 年 3 月 12 日逝世後，更見流傳海內外，其臨終名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尤為國人所瑯瑯上口的名句。此因二十世紀中國國家與社會處於內憂外患，每每對國運隆替及個人得失，時常引此名言勉勵以求進。故直至上世紀八十年代，香港調查青年學子所崇拜人物，孫中山常居榜首，於此可見。

自小學時已得悉孫氏為國父；至中學習國史及公民二科，則知其倡導革命，推翻帝制，建立共和；至大學必修「國父思想」一科，記識《三民主義》之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及民生主義以應考試之需，然皆「水過鴨背」，未尚深究孫氏的生平與思想。直至 1981 年辛亥革命七十周年，時珠海書院（今稱學院）召開「孫逸仙博士與香港」國際學術會議，獲邀出席，遂以〈孫中山之早期思想：農業改良言論探討〉一文與會，此為生平研究孫中山之起點，從而認識孫氏的革新思想及倡導革命，皆與其在港接受中學、大學教育，具有密切關係。自此成為「孫中山與香港」此一研究課題的參與者。就此而論，此一課題當由名史家羅香林（1906－1978）首開其先，而以吳倫霓霞、霍啟昌（1942－2020）、黃宇和等相繼起而研究，均屬香港大學出身之學者。此外，尚有出身華中師範大學之莫世祥及出身台灣師範大學之莊政。青年時代孫氏的歷史身影，即在上列學者的研究撰著下，日見明確。

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降，於教學之餘，亦用心於福建辛亥革命史

之研究，得見孫中山以其倡導革命之魅力，取得閩籍黨人及星馬華僑的信服，共同策動廣州及「粵桂滇」邊區十次武裝起義，形成辛亥革命武裝起義之「香港模式」及「河內模式」，震動朝野。孫氏亦由是奠定其革命領袖之地位，最終導致武昌首義及十五省光復，結束帝制，下開共和。至此對孫氏之革命事跡了解漸多。

2004 年，時獲邀為孫中山紀念館之展覽內容進行研究，主要以「孫中山與香港」此一課題為研究焦點，遂透過對孫氏於省港澳、京滬及海外活動地點進行實地考察；繼而搜集其同期師友的記述、相關革命史料等進行辨析，並以生活史角度切入，重構孫中山在港求學、結識師友及倡導革命之歷程。完成後，孫中山紀念館將此研究計劃的部分成果，出版而成《一生難忘：孫中山在港的求學與革命》（2008）一書，作為開館「宣傳」之用。此書出版後，頗獲好評。

首獲台北中山學術基金會邀約，撰寫《中山先生與港澳》（2012）一書，探究孫氏與港澳雙城關係，説明其於省港澳之革命緣起，利用香港為「大本營」，以澳門為分支，結集海內外之人力、財力及軍火，進而策動以廣州為首及粵桂滇之十次武裝起義，確認「辛亥革命搖籃在香港」之成説。

繼獲邀為香港市區重建局研究「輔仁文社」，作為百子里紀念公園設計內容。再獲香港歷史博物館委託研究「孫中山的省港澳人物地圖」。最後獲邀參加孫中山紀念公園的設計，展示孫中山在港求學與革命的事跡。

隨着上述不同階段，對孫中山的生平研究及參與其在港事跡「雪泥鴻爪」的「活化」重建中，對於孫氏生活在省港澳（或今稱之大灣區）的中西文化交流下此一文化創新地域，得以孕育出其革新思想而步上革命的不歸路途的不凡一生的生平經歷，體認漸深。

與此同時，由於孫中山的革命與建國，對我國影響深遠，故辛亥革命與孫中山研究，向為國內外近代史學者研究的重要課題，研究者

眾，一時成為「顯學」。其中辛亥革命及孫中山壽辰的「周年」，有關研討會更是相繼興辦，形成中國近代史研究中的「紀念史學」，未容忽略。即在此一背景下，先後被邀至北京、武漢、廣州、中山、香港、澳門、台北及東京等各地，出席相關研討會及撰文報告，從而得與中外近代史專家相互切磋，除有助對孫中山及辛亥革命研究視野擴充外，又得見國內學者對孫中山研究，漸由前此「革命先行者」改為「中國（式）現代化先驅者」的研究範式轉移，而出版尤多。對於其時國家推行改革與開放政策的現代化建設方向，不無啟廸。至此，漸將各次研討會的報告進行修訂，相繼成文、成書出版。上述《一生難忘》及《中山先生在港澳》二書，部分內容即源出於此。

時至今年，適逢中山先生誕辰 160 周年之際，緬念其倡導革命之艱辛而得以開創民國，且為未來「新中國」殫精竭思現代化建設藍圖之功。遂將前此相關書、文之舊作，重新補訂彙集，以革命及建國為主題，共收十五篇文章及一篇附錄，成書出版，為孫中山獻身中國之革命由來及所立功業，提供一較為完整的歷史圖像。

上編七章一附錄：乃就省港澳此一中西文化創新地域，探究孫氏青少年時期的成長，重點為其在香港上環荷李活道社區之中央書院、香港西醫書院求學、信教、結識師友及建立革命人脈之由來。

中編四章：説明孫氏於清季民國創立革命團體及改組政黨，以「港—粵」為革命軸心。先於清季策動廣州及粵桂滇十次「香港模式」及「河內模式」（1895－1911）之武裝起義，志在推翻滿清。民國後於廣州建立三次政權（1917、1921、1923），誓師北伐，謀求統一中國。從而揭櫫孫氏的軍事學養及其戰略、戰術，展示其倡導「游勇（擊）戰術」及創立黃埔軍校成立黨軍之由來，影響二十世紀中國革命進程之意義。

下編四章：「革命」與「建國」為孫氏一生追求中國富強所念茲在茲者。自求學以至革命建國，孫氏即以其中西學養，構思中國（式）

現代化藍圖，以《建國方略》（孫文學說、實業計劃、民權初步）及《三民主義》（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遺教最為重要，影響尤大，即為本編研究之重心。然革命後國家「建設之首要在民生」，可見孫氏自年青求學時期，已有首倡農業改良之「先驅」著作，下開其「平均地權」之主張。而更重要則為其英文著作 *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a*（《實業計劃》）一書，主張「利用外資，發展實業」，促成中國工業化而「新闢一世界」，深值研究。而日後台灣得以成為「亞洲四小龍」的「新興工業區」，大陸「接棒」成為「世界工廠」，堪稱受孫氏啟廸而成，亦為對其泉下圓夢之慰。此外，孫氏以信教始，以信教終，其一生劬勞奉獻中國，亦由此留下句號。亦為全書終結之作。

孫中山與辛亥革命研究為上世紀之顯學，投身研究者眾，名家輩出。史學研究必需學有所本，以師承為先，繼而涉獵積學，方能自闢蹊徑。於台北師範大學時，得聽李毓澍師講授「中國現代史」，以馮自由著述為本，只講辛亥革命；張朋園師研究梁啟超與立憲派，明言為結束清王朝之推手；張玉法師研究清季革命及立憲團體，倡言辛亥革命為「全民革命」；時台灣為「威權統治」之時，此與正統之說「推翻清朝乃由孫中山及革命黨」所促成，堪稱「石破天驚」之新說。而王爾敏師出版《孫中山與中華民國：創造時代思想》一書，尤重對孫氏建國藍圖之研究。回港入讀新亞研究所，王德昭師講述孫中山晚年思想，得讀其早年《國父革命思想研究》，至為精審。及至澳洲堪培拉（Canberra）國立澳洲大學（Australia National University）進修，得讀王賡武師早年之研究〈海峽殖民地之保皇黨與革命黨〉；傅澈因（John Fincher）師研究清末立憲運動及民初國會選舉之專書；伊懋可（Mark Elvin）師研究清季上海紳商民主自治之博士論文；同門顏清湟出版《星馬華人與辛亥革命》及馮兆基出版《新軍與辛亥革命》等英文著述，由是拓寬視野。日後得以研究孫中山而有所著述，皆由此而起，故縷述於此，申明學有所本。此後與國內外學者交往日多，相互交流，由是積學，其中華中師範大學前校長章開沅、中山大學前孫中山研究所所長林家有及歷史系趙立彬教授，屢蒙其邀約出席相關國際研討會，最為心感。

此外，本港企業家陳守仁博士，創立孫中山文教福利基金會，推動紀念孫中山「振興中華」之文教活動，蒙其邀任該會理事，並資助浸會大學歷史系近代史研究中心進行孫中山研究及召開研討會，有助本書部分文章之前期研究及外出參加研討會，故特記於此。稍後陳氏更慷慨解囊，於歷史系成立「孫中山基金」，使本系得以持續推動研究孫中山相關課題，最為可喜。

最後，尚須一提者為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副總編輯黎耀強協助出版；前歷史系秘書陳月媚女士相助處理文稿、圖片，亦於此表示謝忱之意。

李金強

浸會大學歷史系近代史研究中心

2026 年 5 月 15 日

目　錄

序言 iii

上編：革命緣起與友好同志

第 1 章｜從省港澳地域觀察孫中山的求學與革命 2

第 2 章｜辛亥革命之搖籃：孫中山與香港 30

第 3 章｜革命「前傳」（上）：
香港中央書院與清季革新運動 42

第 4 章｜革命「前傳」（下）：
孫中山的大學時代（1887－1892） 66

附錄：香港西醫書院的創辦與發展（1887－1912） 93

第 5 章｜四大寇與清季革命之緣起 112

第 6 章｜清季海外華人基督徒的覺醒：
以興中會創會為例 133

第 7 章｜論孫中山的友好及同志 153

中編：革命團體與武裝起義

第 8 章｜香港興中會總會（1895）的
成立及其重要性 176

第 9 章｜同盟會時期（1905－1911）
香港於革命運動中角色的探討 191

第 10 章｜辛亥革命時期武裝起義的再探：
香港、河內及武漢模式 220

第 11 章｜再革命：
孫中山軍事思想及其黃埔建軍之由來 246

下編：建國與遺澤

第 12 章｜孫中山之早期思想：
農業改良言論探討（1887－1895） 276

第 13 章｜中國現代化的寶書：
孫中山與《實業計劃》 293

第 14 章｜中山思想與海峽兩岸及香港發展之關係 320

第 15 章｜孫中山與基督教：
兼論黃宇和〈孫文之信教與被逐〉一文 344

參考書目 367

上編

革命緣起與友好同志

第 1 章

從省港澳地域觀察孫中山的求學與革命

> 數年之間，每於學課餘暇，皆致力於革命之鼓吹，常常往來於香港、澳門之間，……及予卒業之後，懸壺於澳門、羊城兩地，……而實則為革命運動之開始也。
>
> —— 孫中山

青少年時期的孫中山為其立志救國，從事革命的緣起。故每為史家所關注，紛紛對其此一時期的生活及思想進行研究。[1] 較著者如羅香林研究孫氏在香港西醫書院求學歷程及所結識師友與其革命的關係。[2] 陳錫祺探討香港、珠江三角洲及檀香山對孫氏革命思想的影響。[3] 簡又文論述孫氏於香山、檀香山及香港三地的生活與革命的關係。[4] 莊政則以孫氏接受大學教育前後，於香山、檀香山、香港、廣州、澳門各地活動，及師友對其革命思想影響作出研究。[5] 就西方學者而言，早有林百克（Paul Linebarger）指出翠亨村及省港澳對孫中山生活的影響。[6] 更值得注意為史扶鄰（Harold Z. Schiffrin）對孫氏於檀香山、澳門兩地活動關係及香港師友對其革命思想啟廸的精詳研究，並首先指出基督教信仰與孫氏革命思想、活動具有密切的關係，[7] Marie-claire Bergére 則從清季沿海通商口岸如省、港、澳的邊陲新文化地帶分析孫中山革命思想與活動的形成。[8] 而至近日，則有黃宇和於 2011 年辛亥革命百年紀念之際，出版 726 頁的《三十歲前的孫中山 —— 翠亨、檀島、香港 1866－1895》專著，黃氏先後前赴粵、港，以及英美等地，透過「實地調查」及「微觀鑽研」，結合中英史料，由孫氏家世入手，對其青少年時期的生活史實，作了不少新的補充及考訂，充實此一課題的研究內容。

上述學者對於青少年期孫中山的研究，無疑使吾人認識省、港、澳之地域環境，對孫氏革命思想與活動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本文即以上述學者的研究為基礎，從省港澳的地域網絡作為研究取徑，藉此重新檢視青少年時期孫中山的求學與革命，增加吾人對於孫中山革命思想與活動的新了解。

一、成長環境 —— 省港澳

孫中山出生於廣東香山縣（今中山縣）翠亨村。香山縣位於珠江三角洲的南部，為東、西、北三江的出海地帶，於南宋紹興

1 李金強：〈孫中山之早期 —— 農業改良言論探討（1887－1895）〉，見本書；王杰：〈孫中山研究〉，《五十年來的中國近代史研究》（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頁 494－497、511－513。

2 羅香林：《國父的大學時代》（重慶：商務印書館，1945），頁 27－93。

3 陳錫祺：《同盟會成立前的孫中山》（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57），頁 14－31。〈關於孫中山的大學時代〉，《孫中山與辛亥革命論集》（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84），頁 35－64，討論孫氏在港求學及當地師友對其影響。

4 簡又文：〈國父的青年時期〉，《新希望》，55 期（1955），頁 5；56 期（1955），頁 5；57 期（1955），頁 9；又 Jen Yu-Wen and Lindsay Rise, *Sun Yat-sen: Two Commemorative Essays* (Center of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77), pp. 1-22.

5 莊政：《孫中山的大學生涯》（台北：中央日報出版社，1995），頁 12－157。

6 林百克（Paul Linebarger）：〈孫逸仙傳記〉，《中山全集》（上海：良友圖書公司，1931），1 冊，頁 1－13。

7 Harold Z. Schiffrin, *Sun Yat-se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 pp. 10-13.

8 Marie-claire Bergére, *Sun Yat-se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20-41.

二十二年（1152）設縣，此後直至嘉道年間（1796－1850），中原移民相繼南下，生齒日繁，而本土經濟遂得以發展。時香山縣之金星門港，准許外輪停泊，又因其毗鄰葡屬澳門及英屬香港，遂得以吸納外來文化，風氣日開（圖 1.1）。及至清季，隨着人口增長，土地不足分配，具有出海冒險及外向流移精神的香山縣民，相繼移民海外謀生。時值檀香山發展蔗糖與稻米種植，並因縣民陳芳、程汝楫在檀經營蔗糖，商貿成功，吸引不少同鄉透過親屬關係及契約華工方式，於 1852 至 1898 年間蠭湧移民檀香山，以該地為謀生致富之聖地。[9] 自是士、商人才輩出，其中尤以商人、買辦、留學生、華僑最為著稱。[10]

香山鄰接廣州、澳門、香港，三地均為明清兩代華南地區的著名對外貿易港市，藉物產富饒的珠江三角洲為其腹地，進而聯結中外，促成經濟及文化的交流。至近代遂成華南地區的經濟中心及中西文化薈萃的濱海新地域。[11] 就省港澳地理形勢而言，廣州為珠江三角洲的中心，而香港與澳門分處於珠江出口入海的東西兩岸，呈一三角形地帶（圖 1.1）。廣州處於銳角尖，港澳分處兩側而成前衛的態勢，三地隨着時勢推移，其發展過程，遂產生分合互補的動能效應。[12]

9 香山華僑以來自檀香山及澳洲最為著稱。葉顯恩：〈香山移民夏威夷的歷史考察〉，黎志剛：〈近代廣東香山商人的商業網絡〉，王遠明主編：《香山文化》（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6），頁 91－122。黎文並及香山籍澳洲華僑的經濟活動。

10 吳冉彬：〈香山熱土的文明歷程〉，胡波：〈香山與近代中國〉，《香山設縣 850 年》（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3），頁 21－28、91－96。清末民國香山名人輩出，除孫中山父子外，尚有容閎、徐潤、唐廷樞、鄭觀應、唐紹儀、王雲五、吳鐵城等最為著稱。香山商人尤其聞名全國，參黎志剛：〈香山商人的冒險傳統〉，郝延平、魏秀梅主編：《近世中國之傳統與蛻變 —— 劉廣京院士七十五歲祝壽論文集》（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8），上冊，頁 433－450。

11 關於省港澳三地為華南地區的經濟中心，參鄭天祥等著：《以穗港澳為中心的珠江三角經濟地理網絡》（廣州：中山大學學報編輯部，1991），頁 22－40。汪榮祖：〈論晚清變法思想之淵源與發展〉，《晚清變法思想論叢》（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3），頁 88－89，指出港、澳為英、葡所佔，中、西交匯，以廣州為中心珠江三角洲，則為國學茂盛之地，該區由是中西文化匯聚。

12 李國祁：〈由近代港澳的發展論商業殖民的特徵及對華影響〉，《港澳與近代中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國史館，2000），頁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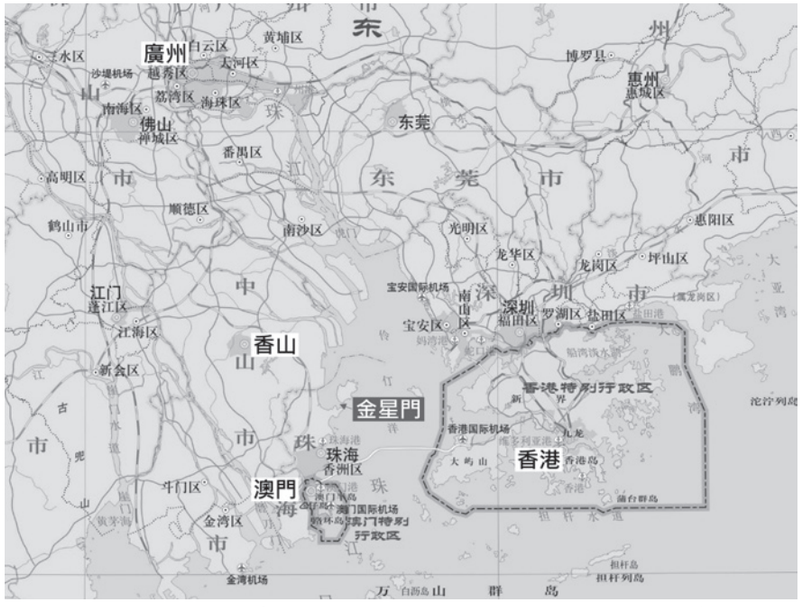


圖 1.1 香山縣金星門港（底圖來源：自然資源部 —— 標準地圖服務〔審圖號：GS(2019)4342 號〕）。

廣州為廣東省省會，別稱羊城，乃該省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原為南越古地，三國始稱廣州，歷唐宋元明清五代至今沿用此稱，只是行政區劃有所變動而已。廣州位於珠江出口，珠江乃由西江、東江及北江匯聚而成。西江源於雲、貴，東江起自江西，而北江則源於粵贛邊界之大庾嶺。廣州遂能與中原、西南各省相通，成為我國物資向南的重要出口。自漢代以降，已具城市規模，且為我國華南對外主要貿易港。至唐代設市舶司，番舶雲集，始設蕃坊，讓外人聚居，貿易至盛。至明清，歐人東來貿易，於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廷採行閉關政策，指定廣州一口通商，遂得以獨佔對外貿易。及至鴉片戰爭後，依據條約，清廷割讓香港及開五口通商，廣州為五口之一，遂成條約港口（Treaty Port，或稱通商口岸）。其對外貿易的地位，漸為他口如上海及香港所奪。可是廣州港市貿易的特性，仍然持續，實為國史上歷久不衰的「長春」港市。歐美基

督教差會如美部會、倫敦傳道會、浸信會、長老會及三巴會相繼派遣傳教士，由香港入粵建堂宣教，並開辦教育、醫療及出版等教會事業，西方文化由是植根廣州。[13]

澳門位於珠江口西南的泊口，明季始稱澳門，而英文 Macau 一詞，乃葡人至澳得見媽閣廟而命名之。至明代嘉靖二十二年（1553）由於葡萄牙租借澳門，其地始見顯達。明清兩代，轄屬香山縣，在「建城設官而縣治之」的地方行政體制及葡人租借管治下，逐漸發展對外貿易，憑藉帆船貿易，通航歐、美、亞各大洲，於十六七世紀成為華南對外貿易的最大港口。鴉片戰爭前，清廷實施廣州一口通商政策，澳門以其外港地位，成為外商入粵貿易之基地。戰後香港開埠，取代澳門，失去轉口貿易地位，葡澳轉而擴張煙、賭業牟利，遂蛻變成賭埠。由於清廷衰弱，至 1887 年，被迫與葡國簽約，變租借為殖民管治地區。澳門原為華人社會，隨着葡人租借及管治，逐漸出現一批土生葡人，此乃長期生活於此的葡裔及父系以葡裔為主的葡、亞混血兒。孫中山在港相識的飛南第（Francisco H. Fernandes）即為土生葡人。隨着明末清初耶穌會士的東來開教，遂成為天主教來華宣教的前哨站，中西文化由是交匯於當地。[14]

至於香港，明清時隸屬新安縣。由於地處珠江東面海口，向為中外海舶會集之港地，至唐代屯兵駐防，遂以屯門一名著稱。[15] 及

13 倪錫英：《廣州》（上海：中華書局，1936），頁 5－6、14－15；陳正祥：《廣東地誌》（香港：天地圖書公司，1978），頁 181－205；吳義雄：《在宗教與世俗之間 —— 基督教新教傳教士在華南沿海的早期活動研究》（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00），頁 140－187，傳教士至粵開教，其歷程乃先於澳門落腳，繼於鴉片戰爭後移至香港，再進入廣州宣教。

14 黃鴻釗：《澳門史》（香港：商務印書館，1987），頁 61－66、102－114、163－184；又參李國祁，同前註，頁 4－7；何偉傑：《澳門 —— 賭城以外的文化關係》（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11），頁 31－32、58－60；霍啟昌：〈「澳門模式」與近代中西關係〉，同李國祁引書，頁 21－43。明代地方官員馭夷，然建立一套防禦機制，允許葡人留澳，以漢法治之，又駐兵關閘，防夷入侵，並設專官及制訂規例，管理澳門一切華夷事務，嚴加管控。此即「建城設官而縣治之」之謂也。霍氏稱之為「澳門模式」，下開清代廣州通商的貿易體制。

15 羅香林：《一八四二年以前之香港及其對外交通 —— 香港前代史》（香港：中國學社，1959），頁 21－46；霍啟昌：〈十九世紀中葉以前的香港〉，王賡武主編：《香港史新編》（香港：三聯書店，1997），上冊，頁 37－58。

至鴉片戰爭後，由英國佔領而成為其殖民管治地區，遂以香港為定稱，而英文 Hong Kong 乃依蜑民方言讀音而譯。憑藉優良港口的地理條件，並在殖民管治政府「不設關市」，採行自由貿易的政策下，隨着 1850 年代以降，國內動亂相尋，導致大量人口南移，人力、財力結集於本地，形成以華人為主體的社會。兼且二次鴉片戰爭（1858－1860）後，加開通商口岸，擴大國內外貿易，遂刺激本港商貿航運發展，[16] 而關鍵在於英國鐵行輪船公司（時稱鐵行火船公司，The Peninsular & Oriental Steam Navigation Company）自 1844 年起，建立倫敦、印度至香港的歐亞航線，以香港為亞洲終站，進而通航澳門、廣州、上海。初以鴉片貿易、華工及南北貨貿易而起。隨着美國、澳洲淘金熱的勃興，國內華人、土貨出洋，皆經香港而至太平洋彼岸，英商怡和（Jardine, Matheson & Co.）、太古（Butterfield and Swire）兩洋行相繼經營對華航運，以至招商局的創建，均帶動香港客、貨運航海業的發展。[17] 而近代市政，如衛生、警察、新式教育以至銀行，輪船交通的相繼建設，使香港逐漸發展成為中國與亞洲、澳、紐、歐、美各地間的轉口貿易及航運樞紐，從而由「一塊石頭變成世界上重要的轉口港」。[18] 與此同時，近代

16 王韜：〈香港略論〉，《弢園文錄外編》（1883）（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4 年，重印），頁 37－58。王氏謂：「值江浙多故，衣冠之避難至粵者，隨海舶來，必道香港，遂為孔道，香港不設關市 …… 行處者樂出其境 …… 前之所謂棄土者，今成雄鎮 …… 。」G.B. Endacott, *A Histor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pp. 194-196.

17 香港開埠及二次鴉片戰爭前後成為國際航運及轉口港中心，參 Baruch Boxer, *Ocean Shipping in the Revolution of Hong Kong*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61), pp. 10-22；洗玉儀：《穿梭太平洋 —— 金山、華人出洋與香港的形成》（香港：中華書局，2019），頁 2－6、15－17、23－28；並參陳鏸勛撰、莫世祥校註：《香港雜記》（1894）（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1996，重印），頁 59－62。

18 吳倫霓霞：〈香港自由地位的建立 —— 從一塊石頭到轉口港〉，《歷史月刊》，32 期（1990），頁 106－117；又清季內地與香港貿易的緊密關係，促成香港的興起，可參 K.C. Fok（霍啟昌）, "Hong Kong's Economic's Relations with China in the Late China Period," *Lecture on Hong Kong History: Hong Kong's Role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Hong Ko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90), pp. 97-117; G.B. Endacott, "Forward," *An Eastern Entreport: A Collection of Documents Illustrating the History of Hong Kong* (London: Her Majesty's Stationary Office, 1964), pp. VI-XVI。

西方文明誕生地 —— 英國的政教亦隨之移植本地，使香港具備西方三權分立及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體系。而英國倫敦傳道會、聖公會、美國浸信會、公理會等亦相繼來港宣教，教育與醫療並重，輸入西方文化，自成一幟，出現大批具有西學新知的雙語華人精英。[19] 香港遂成為近代中國接受西方新文化的窗口。

上述廣州、澳門、香港三地同屬對外貿易的港市，因而「夷風染習」而成中西文化流播匯集之地，且為列強侵華的橋頭堡，民族主義油然而生，成為革命黨的溫床。[20] 故三地具有共同的社會文化特徵，兼且三地鄰接。至二十世紀前後，由於人口自由流通，且因貿易關係，三地的航運及陸路交通相繼興辦，得以互通聲氣。就航運而言，自十九世紀四十年代以降，外商組建省港快輪公司（Hong Kong and Canton Steam Pocket Co.）、鐵行輪船公司，以輪船行走省港兩地，至 1856 年，省港澳的來往輪船已達十四艘之多。至 1872 年省港澳輪船公司成立，專營三地航線，而輪船招商局亦加入競爭。就陸路而言，最具代表性為 1911 年全長 125 哩的廣九鐵路落成通車，強化內地與香港的接觸。省、港、澳三地的區域網絡亦由是完成。[21] 三地皆以粵人為社會主體，營商之華商，亦於三地開設聯號，而慈善團體及教會名校如真光、嶺南、培正、培道、培英

19 王韜：〈香港論略〉，《弢園文錄外編》（1883），頁 261－262。李金強：〈胡禮垣與戊戌維新〉，《書生報國 —— 中國近代變革思想之源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頁 71－72。Carl T. Smith, *Chinese Christians: Elites, Middlemen, and the Church in Hong Kong*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2-11, 139-171.

20 參 Rhoads Murphey, *The Treaty Ports and China's modernization: What Went Wrong?* (Ann Arbor, Midigan, Papers in Chinese Studies, 1970), pp. 1-6.

21 省港澳交通網絡的建立，可參〈百年來港澳交通史〉，〈百年來省港關發發展史話〉，魯言：《香港掌故》（香港：廣角鏡出版社，1977），三集（1981），頁 100－105、167－181；徐日彪：〈近代香港航運業的興起〉，《港澳與近代中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192－193、200－205。Daniel Y.K. Kwan, *Marxist Intellectual and the Chinese Labour Movement: A Study of Tang Zhong Xia (1984-1933)* (Seattle &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7), pp. 52-58; 又明清以來省港澳經濟地理網絡的形成，參鄭天祥等：《以港澳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經濟地理網絡》，同前，頁 52－95；廣九鐵的修建，參李恩涵：〈中英廣九鐵路的交涉〉，《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1 期（1973），頁 139－172。

亦分設三地，「省港澳」一稱由是流播。然隨着香港外貿與經濟地位騰升，澳門式微，而廣州地位不變，且廣九鐵路通車，促進省港關係，「省港」連稱，比比皆是，省港地位與關係日顯。[22] 孫中山倡導反清之武裝起義亦見以「省港」為軸心。及至孫中山成立興中會及同盟會，策動武裝起義，遂透過日、法、德、英各國的郵輪，穿梭往來於亞、歐、美三大洲，聯絡中外人士及各地華僑，宣揚革命，於各地相繼成立興中會及同盟會分會、支部；尋求日歐美之外援；招募起義死士；籌募革命經費及購買軍火，總匯於歐美亞航運樞紐之香港，策動粵桂滇邊區起義（表 1.1）。此即得助於近世輪船航運業的勃興。孫氏乘搭郵輪的「革命航旅」，促成辛亥革命武裝起義「香港模式」及「河內模式」之誕生（圖 1.2 及 1.3）。[23]

上述近代省港澳三地海陸交通的相互連結及密切往來，逐漸形成一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網絡。[24] 此即出生於香山縣的孫中山所處的地域。孫氏一生的生活、經歷及其革命事業的思想與活動，乃來往於省港澳三地，並在此一地域、地緣的歷史、政治及文化氛圍下孕育及形成。其中尤以香港最為關鍵。此即其青年期於此接受中學、醫學教育及歸信基督教的所在地。孫氏在香港，不但獲得信仰與專業知識，並從而產生其政治革新思想與理念，此即孫氏所謂：「我之此等思想發源地即為香港。」[25] 遂起而倡導革命，此後從事組黨、籌款、宣傳、購買軍火，以至於策動武裝起義，均以香港為大本營。故香港實為孫中山革命思想的搖籃，以及革命運動的

22 程美寶：〈從「省港澳」到「粵港澳」—— 歷史失憶與現實定位〉，程美寶、黃素娟主編：《省港澳大眾文化與都市變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頁 11－16。梁佳俊：〈同氣運技：早期同善堂的粵港澳慈善足跡〉，《澳門研究》，1 期（2023），頁 60－71。

23 安東強：〈1905－1911 年孫中山的海上革命之旅〉，《理論月刊》，2021 年 8 月，頁 96－104，安氏稱孫氏藉郵輪來往美歐亞三大洲的革命之旅為「革命的航程」與「船板上的革命」。

24 鄧開頌、陸曉敏：《粵港澳近代關係史》（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頁 1－189。

25 孫中山：〈在香港大學的演說〉，《孫中山全集》，7 卷，頁 115。又省港澳及翠亨村對孫中山生活的影響，可參林百克（Paul Linebarger）：〈孫逸仙傳記〉，《中山全集》，第 1 冊，頁 1－13。

表 1.1　孫中山策動革命的郵輪航程表示例（1895－1911）

年份（月、日）	出發地 / 目的地	乘坐郵輪（公司）	革命活動
1895 年 (11.2－12.6)	香港 / 夏威夷	廣島丸（日本郵船株式會社）	乙未廣州起義失敗，由香港逃亡海外。
1900 年 (7.12－7.24)	新加坡 / 神戶	佐渡丸（同上）	中途停泊香港，籌劃惠州起義。
1902 年 (1.17－1.28)	橫濱 / 香港	八幡丸（同上）	停留士丹利街 24 號《中國日報》社，因港府驅逐令被迫離港。
1902 年 (12.4－12.8)	橫濱 / 西貢	煙迪斯號 (Indus)（佛蘭西火船公司）	應法屬越南總督韜美 (Paul Doumer, 1857－1932) 之邀，途經香港至西貢，再至河內成立興中會。
1905 年 (10.7－?)	橫濱 / 西貢	加利都尼亞號 (Caledonien)（同上）	途經香港 (10.16－17)，在船上主持同盟會分會要員加盟式。
1907 (3.2－3.18)	橫濱 / 新加坡	比連思士亞孺士號 (Prinzess Alice)（總理德國船務公司）	經香港至新加坡，再至河內，改組興中會為同盟會，設總機關，策動粵桂滇省六次起義。
1911 年 (11.24－12.25)	法國馬賽 / 上海	馬瓦號 (Malwa) 至可倫坡，改乘地雲夏號 (Devanha) 至上海（鐵行火船公司）	革命成功，途經香港，回國組建政府。

資料來源：《孫中山與香港 —— 孫中山紀念館展覽圖錄》（香港：香港歷史博物館，2013），頁 169、181－182。

主要基地，而香港亦由是取得近代中國革命史上的中心地位。

二、家鄉、僑鄉 —— 香山與檀香山

出生於香山的孫氏，由於香山社會的僑鄉特性，且因其兄孫眉（1854－1915）（圖 1.4）於 1871 年移民檀香山，任華工而致富，[26]

26　孫眉的生平及日後支持孫中山革命，參孫必勝：《我的曾祖父孫眉》（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1），又其移民檀香山致富，而被譽稱為「茂宜王」，頁 104－178。



圖 1.2　省港澳碼頭



圖 1.3　鐵行火船公司之「地雲夏號」

遂得於少年時期前赴該地生活，習染西方文化，開啟其生命的新視野。日後回歸故里，並南下香港接受西方教育，故此檀香山之旅，無疑為其革新思想的起源地。故首述其於翠亨村及檀香山的少年時期。